

# 再造中国二次人口红利优势

张莱楠

一直以来,人口红利都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重要源泉。据世行估计,人口红利的结构性优势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达到了30%以上。然而随着中国人口结构的转变,中国传统的国家盈利模式受到重大冲击,中国的内生增长动力和比较优势将发生深刻改变,如何在可持续发展模式中,再造“二次人口红利”迫在眉睫。

## 人口红利创造增长奇迹

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保持惊人的高速增长,人口红利的贡献功不可没。从一般理解来看,“人口红利”是指在一个时期内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儿抚养比例下降、总人口中适龄劳动人口比重上升,而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形成的一个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内,总人口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劳动力供给充足,社会负担相对较轻。人口抚养比的下降造就了更具生产性的人口结构,即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额外的源泉,从而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对经济社会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

国际经验表明,所有的先行国家

和地区,都曾经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或多或少地得益于“人口红利”。被美国兰德公司相关研究称之为东亚奇迹和新大陆国家奇迹的是,从1970年到1995年间,在东亚诸国超出常规的高增长率中,由劳动年龄人口占比所做出的GDP贡献比例高达1/2至1/3。北美新大陆开发之初,人均GDP增长率比旧大陆高出部分中,90%至100%可以归于富有生产性的人口结构优势。

## 推进向质量型人口红利转变

然而,“人口红利”从来不是永久性的增长因素。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无法回避老龄化这一客观趋势。随着人口结构转变的完成,这种特殊的增长因素最终要消失殆尽,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不断提高而带来的高生产率与高储蓄率导致较高的资本积累将不复存在。根据瑞银研究,中国劳动人口增速将在2015年后进入下降通道,直接的“人口红利”由此出现下降。传统意义上的数量型“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预示着,仅仅依靠增加生产要素投入的方式将不能维系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与人力资源相关的一切领域,都会发生重大调整,特别是在劳动分工、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以及储蓄、消费、投资、收入

分配、社会保障等领域都需要做出深刻变革。

一般而言,人口红利是通过四种机制转化成对增长的贡献:首先,劳动力数量增长让社会总产出更廉、更丰富;其次,劳动力的流动和资源配置推动劳动生产率提高;再次,有关改善劳动力的一系列投资,包括让劳动者再教育、人力资本培训,从而刺激投资和消费的需求;最后,劳动力和资本组合的优化,让劳动力升级可持续。

然而,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的人口红利只通过前两种机制发生作用。长期以来,我国由于较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供给和廉价的劳动力,企业得以克服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以低廉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获得优势,实现了较长时间的经济持续增长。与此同时,也形成了过分依赖增加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方式。中国还只是停留在数量型发展阶段。真正的质量型“人口红利”的实质是由于人力资本积累,人力资源开发以及劳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使经济发展的成果通过促进人力资本形成转化经济可持续的增长。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中国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消失并不可怕,反而有可能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转型的倒

逼机制。为此,在总体布局上,必须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把人力资源建设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避免陷入低收入—低教育投入—低可行能力—低收入的“恶性循环”。注重发展有利于增加就业含量和开发利用人力资源的经济产业和生产服务领域;在要素投入上,注重通过人力资源的充分开发利用来促进经济增长;在目标导向上,把经济持续增长的过程变成促进就业持续扩大的过程,把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变成对就业拉动能力不断提高的过程;在具体安排上,加大教育制度、就业制度、户籍制度和养老保障制度的改革,为人力资本可持续发展扫除障碍,推动中国发展方式由粗放型的增长向熊彼特式的内涵增长、发展阶段由“生存型阶段”跨入“发展型阶段”的转变。

(作者单位: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

## 焦点评论

# 基金老鼠仓屡禁不止五大原因

兰波

据报道,有关部门正在依法查处深圳两家基金公司的三位基金经理。近年来,基金“老鼠仓”事件不断发生,极大地损害了投资者利益,影响行业信誉。基金老鼠仓事件为何屡禁不止?笔者认为,存在以下五方面原因。

第一,基金经理独特的投资优势,决定了其对信息的独享性,而受到关注。由于基金经理掌握着较多的资源,诸如股票池、仓位调整、资金等。这样,就从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股票的变动。基金经理一时的疏忽大意,或者降低对自己的要求,就有可能造成信息的流失。

第二,基金经理频繁变动,造成基金经理的管理责任缺位。也导致基金经理放松对自身的约束,失去投资的纪律性,从而造成责任的缺失。可以说,凡是能够长期担纲一只基金的基金经理,已经形成一种良好的投资文化,使基金经理更容易做到对投资者负责。

第三,激励机制的局限性,制约着基金经理的管理动力。目前薪酬体系对基金经理的激励存在一定缺陷,造成众多

明星基金经理频繁跳槽,尤其是从事私募基金管理的原因之一。不彻底解决基金经理的根本利益问题,老鼠仓事件就不会得到完全杜绝。

第四,基金管理人内控机制的缺失,也是造成基金经理出现此类事件的原因之一。至少在是基金管理人内部督查及相关规章制度执行,及业务流程方面的弱化管理,是造成基金经理放松自身要求的原因之一。尤其是在基金经理担任此职务之前的工作情况,缺乏必要的审计,从而造成问题的累积。

第五,处罚力度不强,不能起到根本的震慑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对内幕交易作出了规定,但在执行中有关细节还需要进一步细化。

首先,形成查处老鼠仓事件的日常信息搜集制度,鼓励知情人员对基金经理的投资行为进行举报。其次,加强常规性检查,尤其是要围绕“老鼠仓”事件,进行各种形式上的审计工作。第三,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从而对现有的基金经理起到警示教育作用。

## 财经漫画



# “年轻人10年买房”要有切实保障

叶祝颐

重庆市市长王鸿举近日在谈及宜居重庆建设时称要让老百姓有房子住,特别是年轻人,经过自己的努力,十年内能买到称心的住宅;让近乎百分之百的人都能住上带厨房和卫生间的房子,周边也有理想的环境。为此,需要8000亿元来完成,其中政府投入3000亿,其余5000亿主要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来实现。政府投入的3000亿资金中,中央拨付的专项资金占一半。

就“宜居重庆”的话题,今年9月,重庆市副市长黄帆表示,年收入6万元左右的双职工家庭平均6.5年可以买套90平方米的住房。曾引发舆论关注。不出两个月,重庆市市长王鸿举又勾画出“年轻人十年内能买到称心住宅”的住房蓝图。相比几代人出资,年轻人一辈当房奴才能买一套房的境遇,如是住房蓝图让广受高价困扰的消费者看到了一丝希望。

房地产业进入发展快车道的时候,房价超出百姓经济承受能力的问题也逐步显现。针对公众对高房价的疑问,从“双职工6.5年买房”到“年轻人10年

内买房”,尽管两位市长的说法并不完全一致,但是这样的表态传递了民生导向,值得期待。

王鸿举市长不仅描绘了住房蓝图,而且提出了8000亿元打造“宜居重庆”的具体计划,详细了8000亿元资金的来源。笔者期待重庆市能落实宜居资金,在降低地价、房产税等方面体现责任担当,引导开发商放弃暴利思维,让利于民。避免市长口中的住房蓝图成为墙上画饼,让广大重庆市民与憧憬重庆住房蓝图的准重庆市民空欢喜一场。同时,笔者期待,更多地方能在平抑房价,打造宜居城市方面体现责任担当。

按照世界惯例,正常房价收入比3至6倍,然而不少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出现了严重扭曲。以北京为例,北京2008年房价收入比是13.6倍。2009年7月,房价收入比更是达到27倍的峰值。当下,不少楼盘正在向5万元/平方米的天价迈进。广东厅官李惠武坦言自己买不起广州的房子。尽管有人质疑官员买不起房太矫情,但是在高房价语境下,普通工

薪阶层“买不起房”也是现实国情。

笔者注意到,不久前一则未婚女青年“不要房”的新闻引起了热议。有人认为女青年的择偶观念变得理性,但是在我看来,女青年之所以对“住房没有要求”,并非真的不希望圆上家圆梦。而是对当下畸高房价的无奈理性。从当下的楼市数据来看,全国房价都居高不下,新地王不断涌现。目前房价已经严重背离了消费者的经济承受力。缺乏现实购买力支撑的彩旗能飘多久,让人困惑。重庆市长描绘的住房蓝图实际上是在给楼市降温。

尽管某地开发商应政府之约公布房价成本时自曝“亏本销售”。但是种种迹象表明,房价暴利空间并未剔除。国土部组织地房价比例调查,更是曝出“地价两百五房价两万”的楼市暴利猛料。开发商放弃暴利心态,还原房价成本,让更多人买得起房,才是支撑楼市健康发展的关键。如果房价与消费者的收入水平相差太大,楼市除了释放一些刚性需求外,缺乏持久繁荣的原动力。

虽说住房消费已经进入了市场化时代,房价走向应由消费者与开发商在市场框架内博弈。但是从构建和谐社会的层面看,作为百姓重要生活资料的自用住房,不仅仅是一种商品;它实际上带有准公共产品的性质,让百姓“居者有其屋”,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重庆市市长称“年轻人十年内能买到称心的住宅”、“让近乎百分之百的人能住上带厨房和卫生间的房子”,就是政府对百姓居住质量的责任承诺。

要保证百姓居者有其屋,一方面警示开发商改变暴利心态,还原房价成本。另一方面也是提醒地方政府体现责任担当。把经适房、廉租房、限价房等保障项目做好做实,减少对房地产财政的依赖,降低地价、税费让利于民,为房价理性回归提供市场动力。如果开发商不放弃暴利心态,城市不走出房地产财政怪圈,地王数据不断刷新,房价继续高企,不仅楼市繁荣局面难以持久,重庆市长描绘的住房蓝图恐怕也会成为虚假承诺的笑柄。

## 经济时评

# 人民币升值要等待适宜时机

储善胜

人民币是否应该升值,目前业界有很多不同的看法,赞同者与反对者都有十分充分的理由。实际上,他们说的都有道理,关键还在于各方利益该如何权衡和取舍。这个问题解决好了,人民币是否应该升值自然就有了答案。

人民币如果不升值,好处在于有利我国产品的出口,使我国经济增长的三大引擎之一保持足够的动力;弊端是一方面使我国国民福利大量流失,另一方面使我国超额外汇储备不断膨胀,聚集着越来越大的风险。由于我国出口产品多属低附加值产品,它们的生产不仅消耗了大量的能源和劳动力资源,而且还带来了自然环境的污染和破坏,所以其真实成本要远远大于名义成本。这类产品生产、出口得越多,我国所付出的资源和环境的代价就越高,而对应的进口国所得到的好处就越大。不管从资源和环境角度,还是从国民利益角度来看,这类以高能耗和高污染为特征的产品,都不能任其继续生产和出口下去了。要改变这种局面,一方面要对我国家资源价格体制进行改革,使各类资源的价格能真实地反映其内在的价值,这是最为根本的方式;另一方面就是要及时地对汇率进行调整,让人民币适时、适度地升值。

从目前阶段看,让人民币升值显然不妥,因为它会影响我国经济的“保增长”。有关部门之所以在升值呼声很高、外界压力很大的情况下仍然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个因素。其中又涉及我国经济增长方式问题。众所周知,我国经济增长对出口依赖很高。2008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使我国出口的“大好时光”彻底终结。

总之,目前人民币还不具备升值的条件,从明年某个时刻起,人民币才有望开始升值,升值速度的快慢则取决于内需对出口的替代程度,即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速度。不难想象,人民币升值肯定是一个缓慢的长期过程。当然,在人民币升值过程中也会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产生反作用。因此,人民币汇率的调整并非完全是被动的。

# 亚洲经济持续复苏要依靠内需

阿诺布·辛格

在全球经济陷入危机之后,外债依存度高的亚洲国家为何能够一枝独秀,出现迅速而强劲的经济反弹?

亚洲经济复苏之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平均来看,亚洲新兴国家的出口(按工业附加值计算)约占GDP的三分之一,并且这些国家的许多大型企业都是全球资本市场寻求资金。其次,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复苏不稳定。最后,亚洲国家第三季度的GDP数据引人注目:韩国仅第三季度的GDP增长就达3%,新加坡增长更快,而中国在扩大投资的推动下,GDP增长同比高达9%。

我们认为,亚洲经济复苏之谜的答案之一,在于亚洲国家为对抗这场危机所采取的强有力措施。在全球经济出现下滑之后,亚洲国家立即扩大政府开支,大幅减息,并且为资金紧缺的金融市场注入流动性。整体而言,这些亚洲国家的财政计划比G20成员国的规模更为宏大。这些措施的作用十分显著,将今年上半年GDP增长推动了近1.75%。

答案之二,我们认为,是因为从目前所处的经济周期来看,亚洲国家国际贸易的波动远远超过了发达国家GDP的波动范围。全球贸易额于2008年末出现骤减,因此,以出口为导向的亚洲国家的工业产出急剧萎缩,其程度大大超过了处于金融海啸中心的发

达国家。

但从今年2月份开始,国际贸易迅速恢复正常,出现V型强劲反弹,亚洲经济复苏也基本上亦步亦趋。

至于亚洲经济复苏前景如何,我们认为会存在一定的挑战性。未来几个季度,贸易正常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逐步减小。宏观经济刺激措施会持续推动经济增长,但无法支撑太久,经济的最终复苏要依靠国内外私人需求的扩大。

我们认为,全球经济状况会持续好转,但步伐会比较缓慢。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的预测数据看,明年G7的工业产出增长只有1.25%,仅仅能够弥补2009年预计降幅的一半。其主要原因在于受经济危机影响,G7国家的私人需求将持续萎缩。因此,对于亚洲国家来说,海外需求依旧疲软。这意味着亚洲地区的经济增长将远远低于过去10年约6.66%的平均水平。

目前这场经济危机是亚洲经济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所经历的最严重冲击,亚洲国家表现出了一定的经济恢复能力。但是,挑战依然存在。亚洲该如何保持经济复苏趋势,获得真正自我恢复的动力?如何在G7国家需求减弱的状况下恢复经济的高速增长?这些问题需要引起认真的考虑。

(作者单位:IMF亚太部 朱若愚译)